



人文学术
RENWEN XUESHU



通经明道、康国济民

——李觏思想研究

鲁学军◎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013069139



B244.1
03



通经明道、康国济民

——李觏思想研究

鲁学军◎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76412

B244.1

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经明道、康国济民——李觏思想研究/鲁学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9-09847-1

I. 通… II. 鲁… III. 李觏(1009~1059)-思想评论 IV. B2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3236 号

通经明道、康国济民——李觏思想研究
鲁学军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1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847-1/B · 477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航

C1676412

前 言

北宋是我国两汉以来，经六朝和隋唐之后，又一个文化思想高涨时期。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哲人辈出，豪士荟萃。李觏是当时文化界灿烂群星之一。他从“蹭蹬布素，寒饿寂历中，嚼啖道腴，研讨经术，故遇合虽艰，而文章声价，遂上齐庐陵（欧阳修）而且下启南丰（曾巩）也”^①。他在哲学、政治、经济、伦理、教育、法学、军事、文学等多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他的论著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陈国均先生认为，“他的哲学是在我国哲学发展进入宋明时期之伊始，揭开了宋明理学的序幕阶段，它开启了从两宋到明清几百年新儒学的先声。李觏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历史从隋唐转变到两宋时期发挥了继往开来的历史先驱者作用”^②。此论并不为过。

近代以来，对北宋李觏思想的重视和研究源于胡适。胡适是近代第一位热情介绍李觏思想的中国学者。他的《记李觏的学说》一文首次刊于1922年的《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上，使淹没了近九百年的李觏思想重现于世。文中指出了李觏与王安石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并高度地评价道：“李觏是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学者中，几乎没

① 见《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34页。

② 陈国均：《李觏及其哲学思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有一个对手！……近来读他的全集，才知道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①此后，据谢善元先生的研究，巴拉徐教授用德文写了一篇文章，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先驱，介绍给了欧洲读者。日本学者至少有三位曾撰文讨论过李觏，他们是诸桥辙次、本田济和麓保孝，其中本田济在《关于李觏》一文中指出李觏对礼的了解很精辟，“李觏对礼的了解是很精辟的；他的《礼论》是他后期思想的基础”^②。

以上诸君之文都是对李觏思想的初步介绍和涉猎。而第一次系统地研究李觏思想的是美国的谢善元先生于1972年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后译为《李觏之生平及思想》，于198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认为，李觏是一位折中持论的政治思想家，传统儒家政治理论的精炼者、社会批评家，王安石有可能吸收了李觏的思想。中国学者姜国柱先生写了《李觏思想研究》（1984年出版），并在此基础上写了《李觏评传》，于1993年出版。《李觏评传》分析了李觏生活的社会时代，介绍了他的生平著作，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全面评价了李觏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思想，阐发了这些思想的丰富内容、深刻意蕴、进步作用、历史贡献以及当代价值，被认为是一部拓荒补白之作。台湾地区学者夏长朴先生的《李觏与王安石研究》（1989年出版）也较系统地对李觏的思想学说进行了研究，强调了李觏的实用思想以及排佛道的特点。另外，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北宋史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了对李觏思想的介绍和评论，其中侯外庐先生、萧公权先生、韦政通先生、漆侠先生和李祥俊先生等颇有个人见地。

200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南昌大学哲学系与公共

①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第954页。

② 谢善元：《李觏之生平及思想》，中华书局，1988年，第1、4页。

管理学院主办,全国“首届李觏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省南城县秀丽的麻姑山举行,全国各地包括香港的近五十名学者专家与会,国防大学教授姜国柱先生,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黄钊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煜先生,南昌大学副校长邵鸿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郭树森研究员等皆到会并发表论文和讲话,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次会议发表的论文一共有40篇,由《抚州师专学报》出版了《李觏研究专辑》,《江西社会科学》刊登了李觏研究专栏。此举极大地推进了关于李觏思想的学术研究。近来,学者们如乐文华、李祥俊、陈大勇、饶国宾、李承贵、陈国均等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李觏思想进行了新的研究。

然而,相比较学术界其他思想家的研究状况,鉴于李觏如此重要的地位,目前对李觏思想的研究无论从水平和数量还是从广度和深度上说都远远不够,而对李觏哲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是少得可怜。由于历来对李觏的研究较少,故一旦此研究出现,多是阐述他与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关系,关心他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贡献。至于他对儒学的创见、对哲学的开拓,却如蜻蜓点水,谈得不够充分。诚然,李觏著作以社会批评和政论为主,经世致用的特征比较明显,这种特征完全可以从李觏的礼学思想中得到阐明,而“礼”更是原始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观念。以往的研究中,多突出李觏“用”的贡献,没有充分地展示李觏“体”的贡献,更没有很好地说明李觏学说中“体”与“用”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从李觏的政论中梳理出李觏作为一位儒学继承人的思想的一致性来。另外,以往对李觏思想的诸多重要结论是不是完全准确,仍有可商榷之处。比如李觏真如王国轩先生所说的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吗?李觏真的重利轻义或义利双行吗?李觏思想与后期理学家是截然对立的吗?许多问题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我国学界曾经有一段时期高抬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而贬抑理学家,过分强调气本论和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于是,谁若被拉入功利

主义、实用主义或唯物主义阵营就是对谁的肯定，张载就曾被强行拉入唯物主义阵营中。把李觏简单地说成是“唯物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同样有牵强之处。

基于这样的认识，著者认为本书的论题虽然别人已经写过，但完全可以更深入一层，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谢善元先生的研究比较简略，注释的篇幅太大，更像是文献整理式的研究；姜国柱先生是我国学界公认的李觏研究的权威，他在此领域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的诸多结论与《李觏集》的校点者王国轩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但由于时代的不同，现在看来在表述方面不免带有“文革”的痕迹；夏长朴先生的研究较有新意，他从一个台湾地区学者的视角，突出了李觏的实用思想层面，对李觏辟佛思想的讨论比较深入，但也有一些结论值得进一步拓展。本书的研究大量地采纳和吸收了谢善元、姜国柱和夏长朴三位前辈以及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但著者仍然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当然，决不敢“入室操戈”，也希望读者能谅解我的冒失。

研究李觏的思想，突出他关怀现实、改造社会的政治层面，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李觏毕竟是个思想家，他在儒学义理方面的独特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作为宋学的开创性人物之一，他与事功学派和心性学派都有关系，这些关系是怎样的？为什么到宋代后期理学占了上风？他的社会关怀和改革蓝图有哪些理论上的缺陷？这都是著者力图要解决的问题。李觏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也是社会批评家，著者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思想方面，着眼于他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上，因此，从他大量的政论中梳理出他的思想的一致性，从他对社会批评的言论中找出他的哲学前提，也是著者此书的特色之处。

此外，著者没有满足于仅对一个思想家进行平铺直叙的介绍。韦政通先生说得好：“一切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都必须落实到当前的工作上来，‘当前’是过去与未来的交会点，也是复活过

去并决定希望能否变成事实的一个决定性关键。我从没有也不能把过去仅当做过去来了解,也不能空想未来,我能切实把握的是今天。只有一个个充实的今天,才能有充满希望的明天。”^①在李觏研究的背后著者想突出解决如下几个问题:(1)义利关系究竟如何?(2)儒家心性之学是否必然与事功学说发生矛盾?(3)儒学在创立之初就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其理论化的表现体现在哪里?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哲学向来文史哲不分,这也是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特点之一。本书虽然集中于哲学的研究,但不可能作纯哲学的观念阐明,仍不免有许多历史的叙述。由于本书是关于某个人物的研究,很难在论述方法上有太大的突破,所以只能墨守传统,虽不是人物评传,但猛一看目录也不乏评传的嫌疑,唯愿读者能在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出著者用心之处。另外,学术界似乎有个习惯,那就是写谁,就捧谁,常常不惜捧到天上去。著者不赞同这种做法,既然人无完人,当然也没有完美的思想家,故著者对李觏有肯定也有否定。

二

“内圣”、“外王”二词,源自《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发。”^②这里,内圣与外王都属于个人修养之事,是不同的修养层次,指内具圣人之德,外备王者之风。后之学者常用这两个名词描述儒家学问的两个层面:“内圣”指人的道德修养之事;“外王”则指在政治方面的具体施为^③。进而认为,内圣者,伦理学也,属仁的系统,面对价值世界,处理价

①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② 郭庆藩:《庄子集释》四,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9页。

③ 参见朱建民:《张载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170页。

值判断；外王者，政治学也，属智的系统，面对事实世界，处理事实判断。台湾地区学者蔡仁厚先生在分析宋明儒的精神方向时指出，“宋明儒的成就和贡献，毕竟重于内圣一面，外王事功方面，则缺少积极的讲论和表现。此即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①。事实上，儒家就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而言，亦含有外王思想，也就是说，“外王”，既可以指个人投身于实际政治，建功立业的理想和行为，又可以指一种经世致用的救世学说。儒家在道德修养方面有内圣外王之道，在政治理论方面也有内圣外王之道。政治还可分为政治理论、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等，其中理论和实践部分都会涉及道德，亦即内圣问题。因此，简单地将内圣与外王对立起来而来讨论儒家外王之道，并不能说清楚问题。本书把“外王思想”理解为儒家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和儒家政治哲学理论，虽因循流行说法，与儒家“内圣思想”相对照，然绝非相对立。

李觏的外王思想，总体上指李觏对儒家政治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北宋时期，从胡瑗、孙复等“说经以推明治道”到李觏“解经”的“有为之言”，儒学内部一直在酝酿、储积着一股“改变世界”的动力，这股动力在仁宗中叶已跃跃欲试，到了神宗即位的时候则呈破堤而出之势^②。李觏的思想代表了这个时期的特点，那就是经世致用的取向特别明显。李觏是如何从“解经”到“明道”，又到“经世”的？为什么没有走从“解经”到“明道”又到“内圣”这一路？这其中除了历史原因和个人性格之外，在儒家义理方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理脉？这一理脉在李觏那里又是如何呈现的？李觏时代又是北宋心性理学初兴之时，他的思想与理学家是对立的还是与理学的兴起也有关系？本书就

① 参见赵吉惠：《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②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12页。

是带着这些问题进入李觏的研究的。这些问题的解答或许能对宋明儒学“内圣有余，外王不足”的观念产生新的理解。

对李觏的研究可以有不同面向的侧重，本书的理路则侧重介绍李觏的外王思想，以“通经明道，康国济民”为标题，以“明体达用”为主线，用历史与思想相结合的方式，从外到内，再从内到外，全面展示李觏思想的特色。其中夹叙夹议，不时地表达作者的个人见解和对历史、人文的关怀。

时代背景和学术氛围是一种思想产生的必要土壤，生平和个人经历也是不得不介绍的，因此，第一章导论追溯了唐中叶到北宋时儒家思想领域里的变化，简略地介绍了李觏的生平和著作，以及他思想的渊源和学术性格，意在说明李觏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时代的产物，从而由外部给读者一个初步隐约的轮廓。

第二、三、四章是本书的第一部分，直接进入李觏的义理思想，这也是本书的核心，可以用“通经明道”一语来概括。就李觏对“礼”、《易》、“天命”、“性”、“义利”、“王霸”等观念做了系统的论述，可体现出李觏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上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也是李觏经世致用学说的理论前提。其间多涉及原始儒家中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也多采用唐宋间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以作参照。

第五、六章是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李觏的排佛道思想和经世治国思想，可以用“康国济民”概括之。李觏的排佛道思想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在以前的研究中不常见到。李觏既从宗教方面辟佛，又从义理方面批佛，对后期的排佛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著者用了一章的篇幅予以论述，突出了他在理学初兴时期的影响。李觏的政论是《李觏集》的重头，由于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详细，著者就不再做重复性的工作了，只是撮其大要，着重就富国、强兵、安民三方面内容做了铺叙，展示了李觏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运用，旨在表明儒家之道

的基本精神。

第七、八章是本书的第三部分，从宏观上论述了李觏对儒学的贡献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可以用“明体达用”来概括。“明体达用”是李觏思想的整体风格，探索儒家与法家的合璧是李觏对儒家外王思想的突出贡献，而作为一个社会批评家，李觏也有不小的历史性贡献。第八章通过李觏与王安石、张载、陈亮、叶适的思想对比，著者试图提出儒家外王思想的缺失问题，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由于篇幅与学养的原因，本书仅略有涉及。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唐中叶以来儒学领域里的变化 / 1

第二节 李觏的生平及思想发展 / 12

第三节 思想渊源及学术特点 / 22

第二章 推本以见末——礼论 / 29

第一节 “人道之准，世教之主” / 31

第二节 “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 / 37

第三节 李觏重礼思想与《荀子》的关系 / 41

第三章 明体而达用——易论 / 47

第一节 北宋易学述要 / 48

第二节 对刘牧易图论的批评 / 51

第三节 《易》之祸福兴衰之道 / 54

第四章 折中孟荀——人性论 / 70

第一节 “性之品三，人之类五” / 71

第二节 “焉有仁义而不利” / 78

第三节 “霸者岂易与哉” / 83

第五章 承前启后——排佛论 / 90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排佛老思想 / 91

第二节 李觏的排佛老思想 / 97

第三节 佛学界对李觏排佛论的反响 / 105

[附] 关于李觏对佛、道教态度的另一面 / 109

第六章 康国济民——经世论 / 111

第一节 孔子之道的精神 / 112

第二节 “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 / 115

第三节 “明本治军” / 127

第四节 “非教化则性不成” / 134

第七章 李觏对儒学的贡献 / 146

第一节 儒学的使命 / 147

第二节 合内外之道 / 154

第三节 儒法合璧的探索者 / 164

第四节 杰出的社会批评家 / 172

第八章 李觏思想的主要影响 / 181

第一节 李觏对王安石的影响 / 181

第二节 李觏对张载的影响 / 190

第三节 李觏与南宋事功学派的异同 / 196

结论 / 207

附录：关于“李觏不喜孟子” / 213

参考文献 / 227

第一章 导 论

大凡任何一种思想和一位思想家的诞生都与传统思想的历史传承密不可分,也与思想家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更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黑格尔有段常常被人们引用的名言:“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①从纯粹哲学的立场观之,思想有其独立的逻辑发展,历史背景对于哲学思想而言只是外缘因素,但实际上,历史背景对哲学思想本身却具有重大的影响。总体上说,儒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它不仅要求提升个人道德境界,而且要求改变社会现实。因此,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就显得更为密切,儒家理论的任何一次转型都与政治、社会现实息息相关。于是,研究李觏思想不得不涉及北宋时期的大势,也不得不涉及当时的学术大气候。

第一节 唐中叶以来儒学 领域里的变化

自汉以来,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序言》,第12页

理道德、社会心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生活习惯发生激烈冲突。当两种异质文化思想发生冲突之时，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的状态，它对冲突的双方都提出了反思之所以冲突的问题、问题本质以及能否化解和化解的途径。佛教学术文化在吸收中国固有思想的过程中逐渐中国化，中国传统儒家学术思想也在与佛教学术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发生了变化。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和道教教义精密化过程，以及佛教在士大夫和民间的广泛普及，给儒家学者以巨大的震撼和冲击。儒家学术必须改弦更张，必须融合创新，必须从先秦原典中挖掘足以抗衡佛教的资源。唐末、北宋儒学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异域文化——佛教——的挑战。

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混战，使中国社会又一次陷入大分裂、大动乱的局面。纲常失序、道德沦丧、理想失落、精神迷茫的价值颠覆和意义危机，加上长期战乱对文化学术载体书籍的扫荡，文人士子丧失了求学研究的环境，学术典籍荡然无存。唐宋间的儒家学者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凝聚力，必须重整伦理纲常，重建价值理想。他们一方面着力解决现实问题，提倡经世致用，富国强兵，实行政治改革，外御强敌，内安民心；另一方面着力创造新的理论思想和学术形态，重新焕发新的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的召唤力。儒学的复兴，与时代问题亦息息相关。

自唐代中叶以来，两汉经学的传统方法，由于其自身内在弱点暴露无遗，已无法适应经学的发展，而且在佛道思想的兴旺势头之下，儒学愈益相形见绌。在旧的经学研究陷入穷途末路之际，啖助、赵匡、陆质在多年探索《春秋》的基础上，突破旧的局限，提出了总揽全局的新思路、新方法，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之风。与此同时，儒生们还从不同的方面维护儒学，其中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建立儒家道统，为儒学的新趋向指出了新的途径，给宋儒以重要启示。

一、经学的变化和春秋学

唐代后期,与古文运动相呼应,一些学者以新的态度研究儒家经典,使经学发生了变化。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唐代宗大历以后形成不少的“专学”,其中春秋学有啖助、赵匡和陆质三家。其实,这三家是一家,他们在学风上、认识上是一致的。啖助,原籍赵州,后徙关中。天宝末年,客于江东。因安史之乱,留居江南。赵匡,天水人,他曾访问啖助,“深话经义,事多吻合”,唐人吕温、柳宗元都认为赵匡是啖助的学生。陆质是吴郡人,曾师事啖助十一年。啖助死后,他与啖助之子共同整理啖助遗稿,又请赵匡增删修改,撰成《春秋啖赵集传纂例》^①。现存《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微旨》和《春秋集传辨疑》三书,是啖助、赵匡和陆质共同的著作。

以啖助为首的春秋学派之所以能自名其家,首先是因为他们突破了株守章句的学风。赵匡批评当时的科举制度,说:“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②要明儒家之道,睹圣人之奥,入尧舜之域,就不能专守章句训诂,而必须认真研究六经本义。

东汉以来,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公羊、谷梁和左氏三家在唐代都已取得了经的资格,被定为大经,人们对它们敬而有加,不敢有丝毫的怀疑。但啖助指出:“惜乎微言久绝,通儒不作,遗文所存,三传而已。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灭矣”^③,对三传提出了大胆的挑战。啖助认为,《春秋》不同于一般的史书,它“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

① 参见张跃:《唐代后期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② 《全唐文》卷355,《举选议》,转引自《唐代后期儒学》,第37页。

③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转引自同上书,第38页。

因此，读《春秋》就不能像读其他史书那样，把主要精力用于了解史实，而应用主要精力去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然而，遗憾的是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至于研习三传的，更是等而下之：“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玩其文彩，如览史籍，不复知有《春秋》微旨”，如同“买椟还珠”^①。

春秋学派的主要目的，是要引导人们越过三传，直接理解《春秋》经的本义。三传不仅不能体现圣人的精神，反而造成了不好的风气。啖助说：“先儒各守一传，互相弹射，龃龉不若。诡辩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盖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②他们否定三传作为经典的神圣性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并吸取前人注释之长，重新发挥孔子的思想，也试图通过学习儒学的基本精神以解决时代问题。他们自称：“考究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阙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浹洽。尼父之志，庶几可见。”^③

啖助概述了三传对《春秋》宗旨的理解，认为三传都没有明白《春秋》真谛。他把《春秋》的宗旨归结为“救时之弊，革礼之薄”。他说：“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也。”^④简而言之，就是去文从质。文与质的讨论是当时普遍关心的关于政治原则的讨论，同时也是文风学风的讨论。啖助主张政治上去文存质，与古文运动“明道”、“载道”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啖助深情地谈到孔子那拳拳救世之心：“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故历国应聘，希遇贤王，及麟出见伤，知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有其德，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

①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转引自同上书，第3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